

# 邓小平政论文特色略论

陆长生 曾庆元

---

本文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继承发展关系为基点，对三位革命巨人的政论文作了比较研究，并进而论述了邓小平政论文的能动性、可操作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揭示了邓小平政论文的独特风格，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

“邓小平政论文”，这里主要是指《邓小平文选》第3卷所辑录的1982年至1992年2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关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方针政策的119篇讲话、谈话，以及《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的有关篇章。他在这些讲话、谈话中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曲折起伏、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是推动了时代前进的三位巨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伟大之处，是在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代，高举义旗，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掀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邓小平则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形象，紧接着孙中山、毛泽东之后，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的。他的突出的贡献是，在中国革命步入重要关头时，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魄，果断地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政方针，把中国引上了富强康庄的大道。

本文拟运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对三位巨人的理论及其表述的个性、价值进行比较，旨在揭示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以便我们更好地学习和了解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一、一言九鼎——邓小平政论文的能动性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政论文作家。邓小平在《文选》中曾

多次声明,他对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等问题发表的意见,都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的,认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sup>①</sup>。孙中山、毛泽东亦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的文章、著作称之为“政论文”,倒是十分贴切的。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文章、著作,是他们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他们历史功勋的真实记录。与不是政治家的政论家相比,他们的理论勿须争取政治家的认可,便可在政党、政权等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去实施,精神力量可以迅速转化为物质力量。与不是政论家的政治家相比,他们勿须等待术士幕僚的条陈疏奏,勿须经过把他人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意志这一中间环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即是他们自身主体性的体现,即或他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是有益的,也是经过他们的集中、筛选、概括,而后融合在他们的思想里,并以他们独特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作为近现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兼政论家,他们的理论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具有巨大的能动性。“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里的“政治家”是有特殊内涵的,即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前提。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权的力量显然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政论文的巨大力量源泉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前提决定了他们必须站在领袖的高度,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议论治国兴邦的大事,并把认定的方略和政策付诸实施。因此,他们的政论文具有一般政论文不可企及的深度和力度。

由于所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乃至学养及个性都有所不同,其间又有批判继承的关系,所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政论文在思想方法和表现风格上也有较大差异。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遗憾的是,他虽然组织了革命政党,但他始终没有掌握国家机器,只好利用旧势力(新旧军阀等)来完成新任务,致使民主革命的目标功败垂成。这使得他的政论文不免带有一些空想的色彩,激昂中总是隐含着慷慨悲壮的意味,热烈中又不免透露出壮志未酬的遗憾。当人们反复咏诵孙“总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类的“遗训”时,这种感受是强烈的。由于孙中山在当时革命中形成的崇高地位和威望,在革命者眼里,他的训诫也是不可违拗的,他的思想力量,亦是强烈感受到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自己用枪杆子打出天下的,血与火铸就了他的钢铁意志和绝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依靠新的力量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使毛泽东成了新中国缔造者。所以,毛泽东的政论文锋芒毕露,强劲有力。在批判革命的敌人时,它毫不留情,有摧枯拉朽之势;对待内部不同意见,也决不含糊,有舍我其谁之概。如果说孙中山的政论文在现实性上力度还嫌不足的话,毛泽东的一些政论文有时却嫌力度过大,解放以后一些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就同此有关。

邓小平的经历具有大落大起的传奇色彩。建国后他掌管着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但又几次被“削职为民”,长期从事实际工作。政治上的风波,使他紧贴现实生活,养成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可以掌握真理,就可以使工作见成效。所以,邓小平的政论文充满了真理在握的自信,自信它能经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很少引经据典,从不故作高深,在行文时总把平凡的真理尽量用平凡的语言表达出来。真理是颠扑不破的,邓小平政论文的力量源泉首先就在这里。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的言论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在邓小平的政论文中,

却没有以权压人的气势。对待不同意见，他一不取运动形式整人，二不以组织措施开路，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反复宣讲，直到行动起来方止。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方针，但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邓小平认为，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并“允许看”（观望）。他说“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他的办法是试验，经济特区是试验，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地区都搞试点，是好，是坏，“拿事实来说话”。农村搞生产承包，生产一下上去了，不搞的人坐不住了，花了3年的时间“才差不多全跟上”。他善于用成功的事实和马列主义的大道理来说明搞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不搞改革开放的危害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仅以改革开放作标题的文章就有19篇之多，全卷百余篇文章，几乎篇篇都有改革开放的内容。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正是他诲人不倦的结果。当然，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政论文没有政治的力量。改革开放，看看是可以的，但不搞不行，反对更是不允许。唯其如此，邓小平更看重试验和说道理。邓小平相信，把改革开放的道理变成10亿人的共同行动，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到那时，“谁想变也变不了”，因为“人民不答应”。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能动性。

## 二、“多做少说”——邓小平政论文的可操作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产生了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幻想。列宁认为孙中山的愿望不符合中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的实际，他的幻想与“客观条件”脱了节，不仅无法付诸实施，还掩盖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被改造以前，具有空想的特点，根本无法操作。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后，其实践性才得到了加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在规模空前巨大的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是实践的产物，其操作性是很强的。但其操作方式却很特别，这就是他倡导的举世闻名的“群众运动”。建国以前的人民战争，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农村社教直到文化革命，无一不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贯彻实施的。其特点是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有泰山压顶席卷一切之势，对整个社会甚至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强烈的震撼作用。这种方式收效甚快，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因其粗疏急躁，易出偏差。

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主张“多做少说”。多做少说，不是不说，而是不危言耸听，不夸大其词，说得恰如其分。比如阶级斗争的问题，搞经济建设还有没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说当然有，但不能以此为纲。防范、制止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党和国家的经常性的工作，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操作起来十分明确，也十分便捷。

多做少说，是多干实事，不说废话、无关的话，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革初期，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引进外资是否会引进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争议很多。邓小平制止了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

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都干不成。”明确反对坐而论道。如何办?邓小平说了八个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也就是先做起来再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不做如何知道对错呢?如此复杂的问题,就这样被如此简便的操作方法化解了。

多做少说,是经过实践有新的认识再说。比如讲“发展才是硬道路”时,邓小平以广东、江苏经济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的经验为例子,说明治理整顿是有成效的,但必须是为了更快地发展。“能发展就不要阻挡”。否则,就坐失良机,造成经济滑坡,犯历史性错误。他以上海为例,认为在搞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误”。邓小平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谈了如何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力争经济建设“尽可能搞快点的办法”。这实际上为操作这一抽象的原则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毛泽东的政论文内容繁富,几乎无所不包,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文革期间,各行各业都可以从中找到很具体、针对性很强的语录,以作为行为规范或个人行动的依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式乃是群众性的“活学活用”运动。邓小平的政论文的特点不在内容的繁富,而在思想的深刻;不是具体而微,无所不包,而是主题突出,原则明确。思想深刻的表现是紧紧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抓住了这个中心,就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所以,他在文集中反复强调“关键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路”。中心突出,口号明确,不会旁生枝节。对各行各业的要求也很单一,不提具体的工作意见,总是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人们不必在学习领会花费过多精力,找到根据再去实施。“大胆地闯”就是了。对与错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方法党的高级干部可以操作,山里的农民也可照办。

孙中山的政论文偏重于理想的建构,毛泽东的政论文注意思想体系的完备,邓小平的政论文关心实际效果的取得。后者可操作性强正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 三、讲究实效——邓小平政论文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政治家的政论文产生巨大现实影响的内在根据,是政治家思想以及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孙中山、毛泽东的政论文的出发点同邓小平一样,都是为了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孙中山试图通过解决民权、民生和民族面临的问题跨越资本主义,走“集产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的路。毛泽东则主张通过抓阶级斗争,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来促进经济建设(即抓革命,促生产)。但结果,他们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

孙中山的理论虽然有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他“热烈地同情被剥削的劳动者”,列宁赞扬孙中山是“向上发展”并有着“未来”的民主派<sup>②</sup>。但他的理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忘记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任务首先是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解放出来,他要去做历史条件不允许做的事,当然不能成功。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复辟帝制,对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形势的主观判断上。他认为无产阶级掌握

政权以后，阶级斗争会更趋激烈。“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他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建设不仅成了第二位的工作，而且还出现了以主观畅想代替实干精神的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一度滞缓的后果。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基础上的。他了解他的国家，了解他的人民，知道无产阶级执政后，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他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点。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对谬误的反驳上。他是幸运的，因为前人的实践给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是伟大的，因为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超人的胆略，纠正了前人的谬误。党在新时期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以及由此推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他自信地说：“在这短短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缜密严谨是邓小平政论文科学性突出的表现。缜密严谨是讲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顾此失彼。毛泽东、邓小平都讲辩证法。毛泽东多是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哲学道理，追求辩证法普遍品格，例如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则是用抽象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追求辩证法的实在品格。前者偏重于思维的辩证法，以求指导一切实际问题的正确解决，但操作者须有一个学懂了才能运用的转换过程；后者偏重实践的辩证法，以求指导个别的具体问题的正确解决，勿需转换便可直接操作。例如，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过去只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现在看来不全面，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革命成功以后，束缚生产力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除（旧的经济体制、旧观念和错误政策等），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所以需要进行改革。现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里虽然没有理论的归纳，没有提辩证法三个字，但却充满了辩证的眼光。文选中这类例子很多，可谓通篇皆是。诸如改革开放与稳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治理整顿与高速发展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都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求得辩证的解决。

求实精神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即使是谈理想时，他也给人一种可以了望、接近的实在感觉。如在本世纪末至下世纪中期实现翻两番和小康社会的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等。讲究实效使他的政论文不在体系的完备、结构的精巧上做文章，他注重的是思想如何转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邓小平的政论文，无多重解释，不仅易于操作，还有言必行、行必果的效应。

#### 四、独特新颖——邓小平政论文的创造性

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理论时，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虽然都是采用政论的文体，但又各具特色。孙中山主要是运用文白相杂的语言陈述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纲领，表达的是个人的创意，可以商量补充或重新解释，其意在宣传推广，求得追随者的志同道合。我们把他的政论文称之为叙述体（如《三民主义》）。毛泽东主要运用规范的理论语言，以雄辩的方式来表达他深邃的思想，颇具哲人意味。其文往往先破后立，破中有立，或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

常在抓住论敌要害、揭露其谬误本质时，推出自己的意见并显示出自己意见的真理性质，使他的意见具有别无选择、不容置辩的力量；旁征博引，多方论证，周密严整，文采灿然以及压倒一切的气势是他的政论文的独特风格。我们把他的文体称之为论辩体（如《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的理论家，其论文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他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讲过的话。如他提出了初级阶段理论，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确定为全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作中心，把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和基点等。他还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从而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规范了全党的工作和全国人民的行动，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讲“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除了意味着可能出现失误和差错以外（如上海没有辟为经济特区、党内腐败现象滋生、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有时过大过热等），更意味着人们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去创造性地工作。邓小平就是带头这样干的。经济特区的开辟，可以说是邓小平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杰作。它既带有实验的性质，可减少失误，又是一个发明创造；它既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减轻人们在新事物面前的惶惑与不安，又直观地宣传了新事物的优点，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开放的力度提供了示范，邓小平称之为“窗口”作用。如今，经济特区在人们眼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经济怪物了，“特区人”走南闯北，言谈举止，无不透露着一股傲然自得的神情。众多学子，择树而栖，纷纷作“孔雀东南飞。”特别是浦东的开发和迅速崛起以及它强烈的辐射作用，都证实了“特区”的强大生命力。

当今之世，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迅速崛起，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影响着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高科技在迅速发展生产力方面潜在的巨大能量，立刻吸引了头脑敏锐的邓小平。他预言：“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技不行”。为了不丢掉时机，他在国家财力不足情况下，批准了耗资巨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这道理看似简单，但发现和认定它却很不容易。马列都没讲，没有经典作依据，当时又有争论，邓小平敢于提出来，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理论前提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文选》中最具创造性的理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可能是邓小平最大的愿望，但要解决这个复杂棘手的问题，又谈何容易！香港问题是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1997年回归祖国指日可待，但回归之前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回归之后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台湾问题更复杂，这里有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现实中“谁吞掉谁”的问题，也有“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今后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邓小平没有把自己陷在理论是非的纠缠之中，而是从既成事实与解决的可能性出发，不步他人后尘，另辟蹊径，以务实的态度，提出了新的构想。他认为在克服了“左”的错误、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在党内是可以通过的，人民也会接受，因为毕竟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从大陆、台湾目前“谁也不好吞掉谁”的实际出发，指出国家长期分裂

不行，“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情况下，唯有“一国两制”的方式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才可能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提出在香港、台湾，乃至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和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如解决与日本的钓鱼岛以及与越南、菲律宾的南沙群岛的争端等）。无论站在何种立场上的政治家，都不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及其他国际争端的诚意，也不能不钦佩邓小平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灵活态度和高超技巧。当然，“一国两制”是有原则的，这就是必须保持大陆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中央政府的对港台的辖制职能。

## 五、言文合一——邓小平政论文的大众性

邓小平的政论文多为讲话、谈话，带有浓郁的语体文的色彩。语体文的特点是言文合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翻开《邓小平文选》，可以说找不出生字僻词来，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但作为文体格式，语体文又不能像生活语言那样随意、琐碎，它要求作者在日常习见的言语代码中表达深刻、正确而富于创见的思想。邓小平政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做得非常好的。他在西南局任书记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作过充分的调查，事前心中有数。所以，在出席会议时，常常连提纲也不带，一气呵成，讲得大家心服口服。甘惜芬同志在《会议桌前的邓小平同志》一文中说：“大家的话完了，小平同志的压轴戏这才开始登场。只见他不慌不忙，对刚才每一个同志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把他成熟的思想泉水般喷放出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的文章，更是言简意赅，从浅易平实、短小精悍的话语文字中，体现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高瞻远瞩的气势。没有令人目炫的词藻，完全以朴素的道理服人。例如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申述我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他首先表明：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政府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到期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和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不发空论，不尚宏辞，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使听话的对象感到这简单道理的背后是坚定的原则立场。

为了使语体文表达得生动形象，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引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比喻性俗语，来表达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使之易于为群众所接受、所掌握。如他在论述特区的作用时，把特区比作“窗口”，说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把特区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地位说得既形象又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法，则把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是衡量一切是非标准的意思都浓缩在其中了，使发展的问题具有不容置辩、不可商量的性质。又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世界局势和全球战略问题时，他举重若轻地说：“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因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体现了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洞察复杂问题的敏锐目光。

从四川俗语引出并广为流传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比喻，不仅在战争、生产及用人方面都给人们以很多启发，而且把实践第一、工作要讲究实效等原则问题也通俗化了。“摸着石头过河”是延安时期流行的一句话，延河涨水时，人们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才不致遭灭顶之灾。邓小平同志用这话来激励改革者大胆小心，勇于实践，不断探索，以

减少失误,避免损失,不仅使人感到亲切,也指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成了改革者知行合一的指南。

四化事业的蓝图是宏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了把它变成具有动员、鼓舞人心的口号则需要高度的概括,于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四化建设“分三步走”、中国人民的生活“奔小康”等,不仅成了中国四化建设阶段性的标志,还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行动目标。

把深奥的哲理、抽象的原则、博大的思想化为平易朴实、通俗形象、具体可感的意见方法,这是邓小平政论文的突出特点,也是他的理论思想能够迅速掌握群众,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魅力所在。

#### 注 释: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 ②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煌)

---

## 文科学报研究会受委托召开的文科学报工作座谈会 暨常务理事会在京举行

1995年11月1日—6日,国家教委社科司委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召开的委属院校文科学报工作座谈会暨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参加座谈会的除委属院校文科学报负责人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其他院校学报负责人,共40人。座谈会就目前学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分析了问题,揭示了工作难点症结之所在,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国家教委社科司副司长阚延河出席了会议,并对学报工作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意见。会议气氛活跃。

这次常务理事会议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总结1995年工作,研究1996年的工作安排。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会1995年的组织工作、调研工作、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和评奖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表示满意。对1996年的工作安排达到共识,并认为进一步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编辑学的基本原理,将有助于促进学报质量的提高。

(艾 之)